

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许增紘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武昌首义后,各地民众同情、拥护、支持革命,不少官吏对朝廷亦反戈相向,清廷众叛亲离,民心丧尽,瓦解之势成,革命于是迅速取得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而各地“独立”之主持者、参加者、拥护者,目标多集中于反满复汉,对此次革命所奉之主义未必真理解,对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鲜有正确认识,这就使革命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总之,民众的政治倾向、觉悟水平与辛亥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

关键词:辛亥革命;光复;独立;反满复汉;民众觉悟;成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5-0001-06

对辛亥革命与民众问题,史学界在本世纪前的研究中虽然多有涉及,而专题探讨则是近十年内的事,而且至今此类论著仍然不多。笔者拟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时人记述以及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搜集相关资料,对此问题做些许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民众的政治倾向与辛亥革命的胜利

武昌首义成功之后不到50天,内地18个行省中有15个省(包括湖北)和两个重要城市(上海和重庆)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而独立(一些县、市的独立未计在内)。至次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爱新觉罗·溥仪“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

清朝之覆灭,何其快速!如同同盟会成立之时算起,不过六年;若自武昌起义算,则仅仅四个月。革命风潮迅猛发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其原因甚多,而清朝人心丧尽,民众必欲倒之而后快,是很重要的因素。回顾孙中山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时,国人无不目之为乱臣贼子,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之腐败无能愈益暴露,民众对其怨恨亦更加深,对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则渐表同情。故庚子惠州之役败,有识之士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辛亥三·二九起义,“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1]199}。此时,连曾经拥护清廷“新政”的立宪派也彻底失望,民众倒清的愿望更加强烈。故武昌义旗一举,清朝的覆灭也就在指顾间了。可见,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与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孙中山在总结颠覆专制、创建共和那段历史时,对民众之政治倾向与革命胜利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1]207}对此,梁启超在中华民国建立十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深刻的认识。他说:“原来政治是民意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2]835}这种“造成”政治的“民意”,也就是民众的政治倾向,在辛亥革命中具体表现为民众对革命的拥护和对清朝统治的仇恨。

当时民众对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或起义之拥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民众对满清统治极度不满而

* 收稿日期:2011-04-10

作者简介:许增紘(1941-),男,四川富顺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

期望一种新的力量来改变现状——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地方绅商，甚至士兵、警察，投向反抗清朝统治之一方面而与朝廷对立。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官吏（包括一些清廷的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出于对时局的分析和利害的权衡，也“弃暗投明”，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

辛亥前夕，民众对于揭露清朝腐败残忍、宣传反清革命的活动即予默认。当大声疾呼革命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军》出版后，发行至百万册之多，就已反映了民众的态度。在长江上游的泸县，同盟会员余俊英得到《警世钟》、《革命军》后，在其家乡“日持书于城乡市间讲演，听者如堵”^[3]。这种被清廷视为“叛逆”的宣传，在泸县这个长江边上的水码头，竟然“听者如堵”，民众同情革命的政治倾向可见一斑。

四川保路运动被视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由“文明争路”发展而成的保路同志军起义，旬日之间，遍及川省各州县，人数达数十万，已经表明民众对清廷愤愤之情；而对同志军与清廷官、兵的态度，更能说明一般百姓的政治倾向。在川督赵尔丰致内阁电中称，民众见同志军“则助粮助饷，见（清）兵则视同仇讎，甚至求水火而不与”^[4]。也是在四川，自称“突起义军，俨然川中嚆矢”的江津，在闻知各处起义消息后，当地士绅即运动盐防安定营官兵，准备起事。全体营兵一致同意，并赶造汉帜，遍插各铺户。与此同时，县令吴良桐也接受士绅的敦劝，交出印信，于辛亥年九月三十日“竖旗城上，大书‘汉’字，又于高小学校前壁大书四字曰‘蜀军分府’”。吴良桐交印后，成了这个蜀军分府的统帅^[5]²⁴⁷⁻²⁴⁹。江津士绅策动当地驻军、官吏“反正”，完成了“光复”大业。

在湖北，武昌起义后，各地援军源源开赴首义之地。在抗击清军的进攻中，士兵英勇作战，民众积极支持。此仅引述首义十日后黎元洪致萨镇冰信中的一小段，即可概见当时革命军的英勇奋战与民众支持革命的情景。信中说：“即就昨日陆战而论，兵丁各自为战，虽无指挥，亦各奋勇突进。汉族同胞，徒手助战，损坏铁轨者指不胜屈。甚有妇孺馈送面包、茶水入阵。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6]¹⁸⁷

湖北之襄阳地区，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其“光复”，却未费一枪一弹。其所以如此，全赖当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据《时报》报道，当闻知武昌起义之后，当地民众“引领翘首望民军之来，如望岁然”。在临时组织的600余名义兵进攻襄阳城时，坚闭城中的五营清军并未抵抗，义兵遂攀援入城将城门打开。“甫开，来军（指临时组织之义兵）尚未进城，而城内之白旗飞扬空中。城既下……‘襄阳万岁’、‘大汉民国万岁’之欢声聒耳欲聋。是役也，自起义以迄事定，未费一兵，未折一矢，仅三日而谷城，而均州，而南漳、枣阳、宜城等州县均望风反正，可见灾运之当阳而人心之归汉矣。”^[7]⁷²⁴⁻⁷²⁶

最早响应武昌而独立的湖南和陕西，民众和士兵也积极支持、参加革命。

据报道，湖南独立后，“各商民人等欢迎义师，每日鼓乐致送牛羊猪马者不下数十起。绅学各界人等前往投效者，络绎不绝”^[7]⁴⁸⁰。而在江苏的湖南人，为支持革命，组织“旅苏湘团联合协济会”，捐资编练军队，准备北伐。报纸报道协济会成立时之盛况说：与会者四百余人，“先由发起人蒋君凤棠、易君著勋登台演说，略谓：本会宗旨，专为联合湘人筹集巨款，招练湘军数千人，编成敢死队，即行北伐，以定大局。一时闻者无不鼓掌赞成，欢声雷动……当场由众同乡解囊捐助会费，立集数千元之谱”^[7]⁵⁴²⁻⁵⁴³。陕西则由同盟会组织的新军发起、防军支持而完成独立：“新军先哗变，防营应之，蜂拥入省垣，先劫藩库，次据军装局，巡抚钱能训闻警即逃，其他官吏或逃或降，为满清殉难者甚鲜。商民安堵，并无骚扰。”^[8]⁴⁴⁸

江苏经济发达，风气早开，是革命者积极活动的场所，也是革命者宣传的清朝在建国之初的暴行——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发生的地区。因而在这一地区，民众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十分强烈，对革命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少清朝官吏、士兵、警察乃至旗营，无论其动机如何，也表示归顺革命，表现出与革命者合作的态度。至于立宪派诸君附和革命则更不待言。

以苏州光复为例。据《民立报》、《时报》报道，辛亥九月十四日傍晚，有三个民军代表至苏州抚署求见巡抚。程德全立刻请见，“谓诸君来意本抚院早已知悉，极愿共表同情”。苏州全体新军支持光复，防营亦归顺民军。于是，十五日即下令城内外一律悬挂白旗。程德全被推为都督。新军、宪兵、巡警、巡防营均手缠白布，各门城墙则高悬白旗，到上午十时，“如观前街、阊门街，以及道前街一带商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至午后，则住户人家比比皆是。此已见清国人心已去，兵不血刃而自解也”^[7]^{332-333, 339}。苏州光复后，民众又投入支援革命军的工作。以卜明慧医士为会长的“苏州妇女协助受伤军士衣服会”在辛亥九月三十日成立。该会为受伤之革命军士捐助、购置手套、围巾、马甲

等,三日内会员即增至一百余人^{[7]523-524}。

江苏镇江乃南京门户,是江南军事重镇。当革命浪潮席卷江南之际,这些以监视绿营、镇压人民、特别是镇压汉族人民反抗为职责的旗兵,亦表示归顺革命而放弃抵抗。报载,镇江商会绅董于九月十五日邀旗营各佐领开会商议,“各佐领谓,旗营全体咸愿归顺革军,以保生命财产云云。众皆赞成。”十六日,该会绅董与丹徒城自治公所邀集本城满汉文武各官暨绅商学界在万寿宫开会聚议,“各界皆谓,事宜从速,若再游移,全城身家生命必将不保。于是各官皆愿赞成,众人即拍掌大呼‘独立万岁’而散。商会暨自治公所当即遍发传单,宣布独立”。晚间,各商铺皆高悬白旗,而旗营守城弁兵,亦一概撤去^{[7]360-361}。

通州(民国元年改为南通县)是苏北的重要城镇。当地绅商学军各界对革命皆表同情与欢迎。当一小队民军抵达通州港后,当地“军队大表同情,臂缠白布,高张‘光复大汉’白旗,排队至港迎接。协防中队以及工商业、体操会、师范、中学、高等小学各学堂并法团职员,均全队出城欢迎。道旁夹观者,男妇老幼约有万人。武(民)军过处,拍掌之声如雷,西门边(鞭)炮声不绝”。民众即推举民军首领许宏恩为军政长,通州于是“光复”。记者对通州光复之夜作了如下描述:“斯时,正皓月当空,一清如洗,白旗飘扬,欢声雷动。”^{[7]443-444}通州光复后,在南京的通州学生返乡,即“仿上海学生军办法,组织一学生队”,准备北伐,报名入队者颇为踊跃^{[7]469},表现出学生们的革命热情。

松江的情形与通州相似。由于官绅商学军警各界,对革命共表赞同,松江于是宣布独立。其独立之日,“城门城墙以及各衙署、局、所皆高悬白旗。城内外商铺,竞相悬挂。及住户人家,无不触目白旗面面,随风招展。第见‘光复’、‘兴汉’、‘大汉’、‘还我河山’、‘欢迎民军’、‘敬祝民国军万岁’等等字样大书特书……市面交易如常,往来游观者络绎于道,欢声雷动,各界人等均袖缀白布”^{[7]363-364}。《国民公报》也报道说:松江宣布独立后,“市民均高悬红白色方旗,一新世界。旗上大书‘光复’字样:‘国民万岁’、‘恭祝光复’、‘大汉民军亿万岁’。城内外居民咸扶老携幼,欢颜瞻仰”^{[7]463}。人们同情、支持革命之情溢于言表。

如皋、海门等地民众“望光复之心甚切”。他们主动派代表至业已光复的通州面见司令长官。由司令派出40余名敢死队分别到此二处后,即“宣布共和,一律光复”^{[7]469}。

上海于九月十三日独立后,民众用各种方式支持革命:工人主动参军,愿充敢死队开赴前线作战^{[7]405};个人及单位踊跃捐输助饷^{[7]418-419};学生组织北伐团,以“驱逐满虏,恢复神京”^{[7]457}。

一位自海外归国者在“辛亥秋冬百日内”游三江(“吴、皖、赣三省,夙以三江称”)所写的笔记中记述道:“自(辛亥)八月下旬以后,上海人民,无论为土著,为旅居,每怀一种特别心理,如闻民军胜利,则皆喜不自胜;或闻官军胜利,则垂首丧气,默不出声。”^{[9]917}上海民众仇满兴汉之情由此已可概见。

江苏民众对革命的态度如此,浙江的状况与此亦相仿佛。

浙江巡抚虽然拒绝了当地绅商宣告独立的劝告,但是军队和民众却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报载,当部分民军攻入巡抚署后,“抚辕卫队及巡警、消防见势,均一律袖缀白布……其时,防营亦投顺归附。……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极表欢迎,市面照常贸易”^{[7]335-337}。

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光复后,遂组织“苏浙沪镇联军”,克服张勋盘踞的南京,将其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

其他省份的民众对革命亦大表同情和支持。江西独立后出告示招募新兵三千,“应募者极为踊跃。又洪江会头目彭木香率领部下健儿不下三千名投效,已得军政府允许”^{[7]423}。据报道:广东独立前,其“粤城长堤及西关、河南一带,均悬白旗,要求独立。老城新城铺户,均闭门罢市”。“云南省城亦有独立之运动。军队、革党、官绅合为一气。”^{[7]323,324}就是尚未独立的河南,民众亦纷纷以民军之名发动起义。河南谘议局致北京内阁电称:“河南民气,夙称醇朴,起民军者已三十余处,官场诬为土匪,严行剿办而屡仆屡起,民情可见。”^{[7]662}

从以上罗列的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时的民众,其总的政治倾向是同情、支持革命的。这一倾向非常重要。它不仅使革命军在各方面得到群众的支持,壮大了革命势力;而且,使清朝的官弁兵丁慑于此种形势而归附革命。即便是一些顽固不化的官吏,在这种形势下也不敢公然与革命军对抗。这就使革命的军队在很多地方能不费一兵,不折一矢,“传檄而定”。正是因为如此,辛亥革命迅速取得了倾覆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又一次得到了印

证。对此，时人即有清醒认识。他们说，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军，似是乌合之众，武器粗劣，又鲜训练，在一些地方，其数量也大大少于清军。可是，结果是民军胜利了，革命胜利了，光复实现了。这是民心向背之所致。参加过四川江津光复活动、后又任民国《江津县志》协修的夏凤薰，在记述江津反正这段历史后的“赞语”中说：“吾津偏隅僻处，素非用武之区。此次突起义军，俨然川中嚆矢。积威罔畏，螳臂斯张，伟矣抑危矣！人不过佣工牧豎，器不过抬炮鸟枪，想各处大抵如斯。贸然成群，何能抵抗官军如摧枯拉朽？乃人心瓦解，国势土崩，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斩竿揭木，竟以亡秦。吁！可畏哉！”^{[5]250} 那位游三江的归国者，在《三江笔记·自序》中也说：“自武汉三镇，脱清绊羈，全国人心，皆思兴汉。于是万丈波涛，遂奋勇而起”^[9]。参加过光复重庆的向楚，在其纂修的《巴县志·叙录》中，对民众趋向革命的原因和结果作了如下概括：“人民造国，始自辛亥。黄华埋血，路潮继起。疆吏残民，贪臣鬻贿。人心思汉，遂炳大义。百川东之，狂澜一砥”^{[10]2870}。民众像百川东流入海一样地趋向革命，终致肇造了中华民国。

得到民众的拥护对于任何政治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辛亥革命和其后的二次革命作一比较，更能说明此点。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同样是在南方首举义旗宣布独立，同样是辛亥革命时那些主要领导者，可是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个中原因甚多，而民众对此次革命态度冷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对此，左舜生在他 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黄兴评传》中即有所论说：“自宋案发生迄江西崛起，国民党意见即不一致，而各方形势散漫，呼应不灵，财政更无法调度；全国人民对袁世凯仍有相当迷信，而心厌战争，视二次革命若无与己事，其精神与辛亥不同，比较后来的护国之役也完全两样……不及两月，二次革命即归惨败”^[11]。左氏在这里所说的败因，除国民党意见不一、财政困难等等之外，还强调了人民对革命党讨伐的袁世凯迷信尚存，心厌战争，视二次革命为与己无关之事这一因素。在辛亥革命时期，民众是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参与者；而在二次革命中却是旁观者、厌倦者。谁能说这不是辛亥革命胜利、二次革命失败之一原由呢？

二、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民众对辛亥革命的同情、支持，是辛亥革命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样，民众觉悟水平甚低，对辛亥革命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质言之，辛亥革命的失败^①，与民众的觉悟程度关系甚大。以对革命目标的认识而言，无论是革命者、独立后的都督，还是老百姓，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反满复汉”这一水平上。

以四川最早响应武昌起义而对川政影响甚大的重庆为例，在其独立的前一天，“城内有中华民国军政府总司令处告示，略谓：‘本军起义，以兴汉排满、保教安民为宗旨，定期明日入城，人民当照常安业’等语”^{[6]252}。

江南独立各省军政府对革命目标的认识也大体如此，而其外夷内夏、种族主义思想则更加明显。

湖北军政府在《布告全国文》中说：“何物满奴，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满奴者，非他，黑水旧部，女真余孽，犬种兽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掠，盗我财物；继则羨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是所深望于十八行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8]436} 此处虽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字样，从通篇内容看，乃点缀而已。在湖北都督黎元洪发给山东的檄文中，也毫不隐晦其夷夏之辨的思想。檄文说：“降及明季，致失其纪，四方多故。三桂引贼入室，遂使黑水建夷，宰制我天下……呜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清以毡毳遗孽，犬羊贱种，一旦临我华胄，心实内愧，故不惜极力摧残，以为

^① 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学界尚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无所谓失败。它推翻了清廷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设立了议院，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再者，与英国等的革命相比，也并不逊色。所以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无所谓失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革命有成功，有失败。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这是它的胜利。但是，它没能真正实现其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讲，是失败了。如果与英国相比，革命前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争取独立，而英国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前提是必须考虑的。笔者持后一观点。

长治久安之计。三百年来，暴令苛政，罄竹难书……谁无天良，谁无廉耻，忍令锦绣河山，沦于夷狄，文明贵胄，降在舆台，而不思扫除丑类，以雪国耻乎！”^{[8]503}

湖南军政府的讨满檄文也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意味：“皇天不福，降乱中邦。满奴以塞外贱种，藩溷神皋，越二百六十九年。覆我宗社，乱我陵寝，戮我父母，臣妾我兄妹，丧昧人道，罔有天日。”^{[8]446}

赣军都督在通飭各属文中亦是如此：“照得满洲入关以来，占住我土地，蹂躏我人民，攘夺我主权，莽莽神州，沦为夷虜。……凡我汉人，父老子弟，诸姑姊妹，莫不切齿痛心，啣辱饮恨二百余年于兹矣！……我汉人智虑大开，顾虑及此，鄂省首举义旗，光复武汉……克日直捣幽燕，犁庭扫穴。我江西古为豫章之地，文章理学，代有其人，岂容胡虏腥膻，久污中原净土！”^{[7]429}

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时所发檄文，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檄文说：“夫外夷内夏，尼父所以垂箴。以胡乱华，紫阳因而兴叹。维我中土，实号神皋。休休蒸氓，尽圣哲之胄。博博大地，称神明之都。方之五洲，罕可并语。乃自朱明解纽，建虏称戈，率其犬羊，陵我都邑，遂致秦亡宝陇，汉委珠囊。犬戎乱而都墟，麟洲漏而地缺。穿胸陷鼻，播裸俗于神州。玉匣珠襦，肆探丸于枯腊。……盖胡贼之肆虐于我中华者，既二百六十余年……”^{[8]472}

这些文告、檄文，反映出辛亥革命时种族主义思想在许多革命者的头脑中占着主导地位；而民众对革命之拥护，除了“清政不纲”这一重要原因外，深深影响着他们心理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绝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反满复汉最易为老百姓接受，也最能鼓动人心，争取到更多的人投到反抗清朝、支持革命的阵营中来；而这种思想的消极作用在以后也会逐渐显露出来。

此外，民众中的帝王思想也若隐若现。报载，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南京的民众正在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准备庆祝时，“此间愚民，多误以为新皇帝驾临，有闭户不敢进者”^{[7]668}。时隔不久，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时报》又登出了一篇福建福安县以民军名义发布而传布四方的檄文。这是一篇号召“识时务者”加入“民军”、效法起于草野的刘邦、朱元璋夺取帝位的文告。檄文曰：

……华国民军，为汉同胞脱离苦海，正满清政府将丧主权，臣庶离心，凡有英雄，皆思奋起。……呜呼！时不可再，机故难逢。将相王侯，非有真种。智能明哲，及早为谋。西汉成家，不过泗上亭长；大明有国，只缘抄化贫僧。丈夫当举大名，壮士不忘乱世。既经发起，须表同情。或化家为国，易侯为王，未可量也。爰书数语，广告同胞：有志观光，速来赞事，无须畏缩，曷复狐疑。若虑无成，财命难保，真非识时务者也。^{[7]705}

《时报》认为，此乃“纯属帝王思想之文章”，是当地土匪图谋不轨，伪托民军而发布的文告。其实，发布文告者未必就是土匪，也未必知道“民军”为何物，而以为王侯将相，并非有种，乱世出英雄，孰知现在揭竿而起者，非当今之汉高帝、明太祖乎！联系到民国首都尚有“愚民”视大总统就位为新皇帝驾临的看法，此檄反映出在“愚民”中确有以为这场革命是在改朝换代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民众，对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怎么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呢？

至于对民权、共和、自由、平等，民众则更难理解其真义。

民国十七年出版的《涪陵县续修县志》，记述了该县独立时的一段往事：1911年10月20日涪陵独立后，设立了以高亚衡为司令的军政府。后来蜀军政府成立，涪陵即取消军政府名义，但仍以高为司令，统辖军民两政。“时，乡愚无知，误解平等自由以为无法无纪，抢劫捉榷之案，层见叠出，徐芝（时任司法庭长）闻报，即派队拘案，随讯随结，一月戮五十余人，乡间粗定。”^[12]

由张森楷总纂、刊于民国九年的《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在探究当时社会上“穷奢极欲，靡所底止”的原因时，引用“广益粹论”之文而发议论道：“昔人因时图治，已急急于定经制，隆学校，严赏罚不已……今则国以民称，父老子弟，一例视为同胞。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经制无可言，学校无可言，赏罚无可言。甚哉其急也！盖自西力东渐，挟其偏宕急激之学说以与之俱。吾国喜新厌故之学者，喜其学之足以猖狂而自恣也，于是毁冠裂冕，剖斗折衡，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垂创者毅然毁弃而不之惜。言国体则高语共和，言小己则醉心自由，邪说僻行，交乱中国，虽以法令之严，三令五申而不足以遏其流。夫吾国之所以逊于欧西者，特其算术、制造形下之学焉耳。若夫尽性至命之奥，君臣父子之伦，所以搆天柱而立人极者，固未尝或逊于彼。今不取彼之所独长以补吾之所不及，而转弃吾所固有以盲从之……哲学之自

由,政法之民权,乃器然争胜于社会之间,广益粹论,风俗由兹而大变”^[13]。

辛亥革命时期的“乡愚”把自由理解为无法无纪;离辛亥革命爆发已近十年,在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合川,由在晚清曾经办过实业、参加过保路运动的史学家主持修纂的合川县志,还赞同将民权、共和、自由、平等视为“邪说僻行”,并认为这些“邪说”“交乱中国”,败坏了社会风俗,一般民众对民主、自由、民权、共和认识水平之低则更可想见。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民众对革命的认识水平,经历过辛亥南北议和的张国淦,在其搜集整理的《辛亥革命史料》的序中有这样的品评:“此次革命系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发生的:在北方者,犹是封建专制思想,不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何事;在南方者,亦不完全了解革命真义所在,即响应各省,多半为民意所鼓荡而已”^[6]。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

一场改革或革命要想成功,须有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而参与改革或革命的民众之觉悟程度,对改革或革命的成败关系绝非一般。梁启超从辛亥革命未能达其初衷论说了民众觉悟与政治活动成败的关系:“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2]^[834]换言之,民众尚未觉悟,对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了无所知或知之无多,用传统的旧的文化心理、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去实行新的民主制度,是难以成功的。这正是辛亥革命不能取得完全胜利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笔者曾以“旧文化孕育出的新都督”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对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表现出的矛盾和尴尬做过分析,并得出过如下结论:一个人的文化思想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革命浪潮腾涌之际,受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支配的人,也可能被卷入革命洪流,为革命做一些有益之事。可是,当革命需要发展,在艰难竭蹶中需要坚持和辨明方向时,他们就难以跟上前进的步伐了。良者落荒而逃,洁身自好;劣者,或将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似乎可以说,这是被中世纪思想左右的人参加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必然归宿。由此,又给人们以如下启示: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应从人们文化思想的深层去寻找原因^[14]。此一观点,今天看来似亦无大谬。对个人如此,对“民众”这个群体,也应作如是观。如果民众甚至多数革命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对革命的目标及民主、自由、民权、共和等的认识还处于前述的那种状态,要想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何其难哉!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能迅速取得倾覆清廷、革除专制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众觉悟到非倒清不可而对反清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其失败,与民众对革命真义的觉悟甚低亦关系重大。正如胡汉民在阐述《民报》六大主义的文章中所说:“革命为就一时所为之事业,其举动与社会共之,故社会程度之高下,与革命成绩之优劣为正比例。人故恒言:欲得伟人之铸其群,非得群之先铸伟人不可。”^[15]故通过教育、宣传,全面提高民众觉悟,对取得革命胜利,巩固革命成果,将起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 李华兴,吴嘉勋. 梁启超选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3] 四川文献研究社. 新修方志丛刊·泸县志(二)[M]. 台北:学生书局影印初版,1967:747.
- [4] 赵公季和电稿[M]//隗瀛涛. 四川近代史稿.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662.
- [5] 四川文献研究社. 新修方志丛刊·江津县志(一)[M]. 台北:学生书局影印初版,1967.
- [6] 张国淦. 辛亥革命史料[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 [7] 渤海寿臣辑. 辛亥革命始末记[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 [8] 曹荣. 各省独立史别裁[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53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 [9] 三江游客. 三江笔记[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 [10] 四川文献研究社. 新修方志丛刊·巴县志(六)[M]. 台北:学生书局影印初版,1967:2870.
- [11] 萧致治. 湖湘文库·黄兴研究著作述要[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214
- [12] 四川文献研究社. 新修方志丛刊·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M]. 台北:学生书局影印初版,1971:810.
- [13] 四川文献研究社. 新修方志丛刊·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七)[M]. 台北:学生书局影印初版,1968:2901-2902.
- [14] 曾绍敏主编. 荣昌首义与辛亥革命[M].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314.
- [15] 张树,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372.